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

诗经

思想研究

杨洁◎著

海外篇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

诗经

思想研究

杨洁◎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诗经》思想研究 / 杨洁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08-73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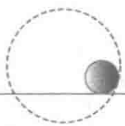
I. ①地… II. ①杨…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7178号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诗经》思想研究

作 者	杨 洁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 开
印 张	7
字 数	11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364-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学是文化的结晶和载体，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承载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就是一部反映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百科全书，特别是代表各地民歌的国风体现出较强的地域文化色彩，是承载我国地域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文本之一。对《诗经》尤其是“十五国风”进行地域文化视角的分析和探索，是《诗经》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诗经》可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代表的是音乐曲调，国风就是不同国家地区的音乐调子，产生于周代各诸侯国地域的文化作品。《诗经》中共包含了十五国风，一共有 160 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豳风、鄘风、卫风、秦风等。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 31 篇都是西周时期的作品，作者一般都是贵族阶层。小雅 74 篇大部分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其余少数有可能属于东周时期，作者以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为主；颂主要是祭祀祖先的音乐，舞曲占大多数。共 40 篇，其中包括周颂 31 篇，鲁颂 4 篇和商颂 5 篇，另外还有 6 篇笙诗，有目无词，即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诗经》主要反映了周代至春秋中叶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的风貌，作品的作者涉及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物且绝大部分已经不可考证，大约在公元前 6 世纪中叶编订成书。本文第二章对其内容做了更加详细的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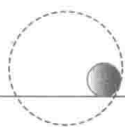
《诗经》是中国先秦时期丰厚历史文化的沉淀，其诗歌的体裁结构、语言表达和艺术手法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论从其产生的地域范围，还是诗歌本身所表现的思想内容，都代表着所产生地区独特的地域风格。《诗经》不仅具有周代诗歌的一些共同特点，同时也具有较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本书的第一章首先以地域文化的概念和特征为出发点对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进行了区分；其次，阐述了地域文化与《诗经》之间的联系；最后，对地

域文化的形成及其原因进行了探索。

本书从第三章开始,以《齐风》《豳风》《邶风》《鄘风》《卫风》《秦风》《齐风》为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相应的国家地区所承载的文化进行剖析:《齐风》的写作手法、文学特色及其所呈现的社会风貌;《邶风》《鄘风》和《卫风》的艺术特征;《豳风》和《秦风》的主要思想和审美特点。

通过本书的剖析可知,《诗经》中的国风反映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地域文化,而多彩的地域文化对诗歌的内容和创作风格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对《诗经》及其地域文化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思想;另一方面有助于现代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更深层次的了解以及对优秀文化的传承。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引用和借鉴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原作者和出版者表示诚挚的感谢!为了使本书及时和顺利出版,相关领导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及作者的能力有限,书中肯定还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中国地域文化概览	1
第一节 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	1
第二节 地域文化与《诗经》	4
第三节 地域文化的形成	10
第二章 《诗经》主要思想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13
第一节 《诗经》概览	13
第二节 生产劳动与爱情婚姻	16
第三节 徭役战争与政治讽刺	21
第四节 从《诗经》看当时的中国地域文化	25
第五节 地域文化对诗风的影响	30
第三章 《齐风》地域文化与思想研究	32
第一节 《齐风》的手法与文学特色	32
第二节 《齐风》反映的社会风貌	42
第三节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齐风》	46
第四章 《豳风》地域文化与思想研究	49
第一节 “豳”地地域考辨及其地域文化	49
第二节 《豳风》的主要思想	56
第三节 《豳风》的审美特点	62
第五章 《邶风》《鄘风》《卫风》地域文化与思想研究	72
第一节 邶、鄘、卫三地地域考辨及其地域文化	72
第二节 《邶风》《鄘风》《卫风》的艺术特征	77

第三节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邶风》《鄘风》《卫风》	81
第六章 《秦风》地域文化与思想研究	87
第一节 秦陇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概览	87
第二节 《秦风》的主要思想与审美特点	89
第三节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秦风》	97
参考文献	99

第一章 中国地域文化概览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对地域文化进行了概述。首先，以“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含义为起点，从划分依据和空间范围对两者进行了区分，然后对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地域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以阐述，最后介绍了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主要原因。

第一节 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

一、“地域文化”的含义

地域文化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相互交错的概念。地域是按历史、地理、语言和一般文化等条件人为地划分出的大地区。“文化”这个在现代社会处处可见的词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是：①是特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②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一般的知识；③特指某一领域或范畴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④考古学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

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区域或一个空间范围的文化特点的文化类型。它不是今天才被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在《史记》中司马迁就对早期的地域文化做出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概括，这种差异就是地域文化。“风”，就是流行；“俗”是习惯，就是在流行很长时间后被积淀下来的东西。在今天，我们已经把它们合为一个词“风俗”，用来描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人继承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的（按历史、地理、语言和一般文化等条件划分的）空间场域，由地理、气候、生活的人的行为和思维模式，经过

较长时间的积累、叠加后，积淀保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地域文化大抵可以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层面可以表现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如民族、区域）内人的行为生产活动、思想活动的特征，也可以表现经过长时间不断叠加、沉淀、积累后，呈现出的人类活动习惯和特征以及思想、思维模式。

二、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一）地域文化具有地域性

地域文化的产生是某一地域的人们在和自然、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其传播具有地域性，并具有和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特征。如吴越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个体。

（二）地域文化具有亲缘性

地域文化还是与本地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地域文化是本地人民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亲身接触并参与其中的文化。一个生活在吴地的人既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依靠现代化的媒体，看到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也可以亲临其境深切体验种种不同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对于他来说，都是临时性的接触对象，是外在的，可有可无的；他之于文化，犹如参观者之于博物馆的展览品。而地域文化则不然，个体与地域文化之间水乳交融，难以分离，人们既是地域文化的欣赏者，更是地域文化的创作者和实践者，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本体所在。人一出生，便毫无选择地落入一个文化之网，他不得不借助于这个网维护自己的生存。这个文化之网是既定的，他只有在适应的前提下，才能生存与发展。

（三）地域文化具有潜在性

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地域文化是具有潜在性的。虽然个体对于地域文化最初是被迫接受的，但一个人在既定的地域文化中生活久了，便也不自觉地现出种种的文化烙印，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周围人们的一言一行之间，他的身心和周围的一草一木之间已经达成了默契；他已经被融化其中而不自知，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四) 地域文化具有边缘性

相对于中华文化的共性而言,长期以来,文化个性在课程中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依据地域文化在我国大陆现行课程中的地位,我们还可赋予它另一个特征,即地域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

三、“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区别

“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地域文化相比,“乡土文化”是一个使用较为广泛,同时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我们从日常生活用语和专业术语两个角度对“乡土文化”进行探讨。为了更好地说明“乡土文化”概念,首先探讨“乡土”二字。我们首先考察“乡土”一词的来源。在我国,“乡土”概念的产生和“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乡土”的根在于一个“土”字。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形象地描绘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因而,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用语,“乡土”通常指一个人长期居住和生活(特别是幼年时期长期居住和生活)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在其空间范围上,则因人而异。“乡土文化”具备日常生活用语中“指一个人长期居住和生活(特别是幼年时期长期居住和生活),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地方”这一含义,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可以发现,多数情况下其空间范围是以行政区划为依据的。人们通常把“乡土文化”作为和某一行政地区相对应的文化实体。

植根于土地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孕育出相应的宗族制度,并由此孕育出相应的“乡土意识”,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特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割断了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然而,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经济,使得“乡土”情节积淀至深,一方面,乡土事实上不断被城市所占据,乡土的空间外延随之发生变化,而“乡土意识”却以变化了的形式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

“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可以着重从两个方面对两者加以区分。

第一,划分依据不同。

地域文化的划分有着严格的标准,依据各个文化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区分,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地域文化是一个由紧密联系、具有因果联系的各个文化要素整合而成的文化复合体。比如,齐文化、东夷文化、中原文化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而各个文化内部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形态是相互整合而为一体的。

乡土文化的划分则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在实际使用中,多依据行政区划划

分。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关中文化等等。

第二，空间范围不同。

地域文化的空间范围有着较为明确而稳定的界定，不能任意而定。

由于人们在使用“乡土文化”概念时，通常以作为行政区划单位的地方作为空间范围，因此，“乡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空间范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比如，同一个行政区内可能存在若干个地域文化。比如，作为行政区划的陕西省内包括陕北榆林文化、关中文化、陕南文化等几个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确定应以文化地域的相对独立性为依据，行政区虽然多是历史的形成，但它和文化地域并非完全一致，因此不能作为划分地域文化的条件和准绳，而必须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

第二节 地域文化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元典、儒家五经之一。关于《诗经》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古代学者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发挥《诗经》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经学义理的考辨与诠释、《诗经》典籍的注疏与整理。虽然，在经学一统时代，主旨大义的阐发和名物典章的诠释一直是《诗经》学研究的重心所在，但在《诗经》篇章结构中，不同国风的地域文化特征、思想表现的地域性、意象风物的地域性却是客观的事实。

一、《诗经》地域文化研究

古代与《诗经》相关的地域文化研究多存在于地理学著作之中，而且往往作为《诗经》博物学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史记》《汉书》略述山川地理特征与风俗文化的关系，唐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王应麟《诗地理考》、清朱右曾《诗地理征》、雍正梓《十五国地理图》、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等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诠释了《诗经》的地理方位、历史沿革，属地理考据研究。

其实，研究者对地域与《诗经》国风的探讨从古代便已开始。先秦时期的《左传》卷九《襄公二十九年》，成为人们常引用的例子。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乐工为其演奏了国风中的大部分，还有雅乐及颂。《襄公二十九年》载：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公子札对《诗经》风、雅、颂都给出了自己的感受和评价。其一，他联系地域文化特色，结合历史文化背景来论述，如提到卫风的“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郑风的“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豳风的“其周公之东乎？”都是结合历史背景所抒发的听到歌乐后的感受。其二，结合地域特色进行评价，如论述齐风的“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提到了齐国处于沿海地带，大海的广阔给齐地带来一种豁达宏阔之风。其三，对歌、乐、舞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如对颂的评价。

汉代对诗经的研究主要是今古文诗及郑玄。今文《诗经》包括齐、鲁、韩三家，古文《诗经》主要指毛诗学派。古文诗由郑玄做笺后流传下来，今文诗逐渐亡佚，只能从焦延寿《焦氏易林》、刘向《列女传》、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搜寻有关观点。四家诗在研究齐风、豳风、郑风、卫风时，有几个共同点：其一，重在将诗歌与西周、春秋时的史实相比附，尽力为诗歌寻找历史依据，攀附史实进行解释。其二，因循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重在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如《毛诗序》对齐风十一首诗的解读均为“刺”，便是为了发挥诗歌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社会功用。郑玄谨守《诗大序》，阐发诗义多从毛传，并往

往以礼笺《诗》。通过笺《诗》，表达个人对时事和命运的关注。

除此之外，汉代的史书对地域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更为精辟。《史记》和《汉书》均有相关记述。《史记·货殖列传》开始记录不同地域的地理风貌和物产民俗，记述较为简略。“（齐人）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鲁人俗俭嗇。”

《汉书》较详细地论述了不同地理位置、山川风貌、物产及兴废历史，还论及了地域对风俗文化和人民性格的影响。对探究地域文化对国风的关系影响有重要参考价值。仅以齐、鲁、郑、卫地举例来看，《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

太公以齐地负海舄鹵，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鲁地）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地陋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嗇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郑地）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的贡献总结起来，其一对古时山川地理划分进行了论述；其二对历史兴废进行论述；其三对地域风俗文化进行了阐释。且论述较为详尽，符合史实。

后代继承这一脉络，以地理文化探究《诗经》本义，出现了唐代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代王应麟《诗地理考》、清代朱右曾

《诗地理征》七卷、雍正梓《十五国地理图》桂文灿《毛诗释地》六卷、尹继美《诗地理考略》二卷，图一卷等著作。

三国至唐代，三国时期著名经学家王肃作有《毛诗义驳》《毛诗问难》等，惜今不传。魏晋南北朝时期徐遵明、雷次宗、周续之等经学家作品也散逸。隋唐时期孔颖达受唐太宗指令，编纂《五经正义》，其中的《毛诗正义》代表了唐代官方对《诗经》的态度和解读。其一，《毛诗正义》多先依据毛诗和郑笺点明诗歌主旨，串讲经义，如传笺有不同，再对郑笺与毛诗不同之处进行解释，疏不破注。其二，继承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重视《诗经》的教化功能。

宋元时期，从欧阳修开始，一股疑经、思辨的思潮兴起，形成与先秦和汉唐的诗学不同的特色。欧阳修以怀疑精神对待《诗大序》，力求探求《诗经》的本义。苏辙主张废除《诗大序》，阐述诗的本义。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辩说》等，成为疑古学派的代表，他提出了许多对当今研究仍较有价值的看法。其一，重新考察《诗经》的本义，而非归于温柔敦厚的诗教。认为《诗经》乃男女自述其事其情，并非为了讽刺时事，否定了《诗大序》中的怨刺之说。其二，对《诗经》的文学性有相当认识，开始对诗作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探讨。其三，不盲从《诗大序》，而是从诗作内容出发评价其得失。朱熹之后，王安石、吕祖谦等也对《诗经》有所探讨。

明清时期，又有许多学者对《诗经》提出独到的见解，包括明代的季本，明中后期戴君恩、万时华，清代胡承珙、马瑞辰、陈奂；姚际恒、方玉润、牟庭、牟应震；魏源、王先谦等都对《诗经》提出了卓有成就的观点和看法。明代戴君恩的《读风臆评》和万时华的《诗经偶笺》都重视《诗经》的文学性，用文学鉴赏的方式来品读《诗经》，都认为其具有教化功能，是运用诗歌所独特的讽谏方式，来发挥其社会功用。清初研究《诗经》的倾向由“宋学”向“汉学”回归，多数学者重新尊奉《毛诗序》的观点。胡承珙的《毛诗后笺》主要是申述毛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继承了《毛诗序》的美刺传统，将诗作看成对政治起作用的附属品。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批评前说的基础上，探求《诗经》本意，批判前说之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不受前代成说的影响，探求《诗经》本义；重视《诗经》的文学性，从文学角度对诗作从创作方法、艺术特点等方面加以鉴赏和解读。牟庭、牟应震善于独创新说、提成新见。今文诗学在清代复兴，魏源、王先谦都属代表人物，魏源反对古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今文经学。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辑录了前代的佚文遗说，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成为前代《诗经》研究文献的集大成之作。

汉代之后学者对国风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古文诗和今文三家诗的认同或反驳,重视《诗经》的社会教化作用,从文学角度探讨其艺术价值。而到了近代,学者们又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来解读《诗经》的艺术性。

王国维对《诗经》研究提出新见解,一是运用甲骨文和金文材料解读一些诗句,开启《诗经》研究材料的新途径。二是运用词语的本义来探求《诗经》原意。王国维的研究具有新意,而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闻一多和郭沫若更加拓宽了研究途径,从文字学、训诂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加以探究。闻一多的《风诗类钞》《诗经通义》和《诗经新义》对《诗经》国风中爱情诗中的隐语,含义多有解读,认为类似词语在国风中出现时具有相似的意义,如“饥”“伐薪”等词语都与婚姻爱情有关,这些结合语言文字学和社会学的解读在当时颇有创见。郭沫若对《诗经》的研究更偏重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他以《诗经》为材料,研究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在对时代历史背景详细把握的基础上,诗作的研究则更为深入有见地。如对《豳风·七月》的考证就颇有新意,为人们所称道和多次引用。同时期著作还有谢无量的《诗经研究》,从宗法制度、道德观念、时人思想等社会文化范畴研究诗作。胡朴安的《诗经学》,对《诗经》的研究历史进行分析总结。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探讨毛诗和三家诗的传承问题,讨论《诗经》与音乐的关系。朱东润的《读诗四论》对《诗经》中四个重大问题提出个人见解。还有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与胡适、顾颉刚的有关《诗经》研究的论文。

现当代的《诗经》学研究,在继承经学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是《诗经》的专题研究与对历代研究的再阐释,另一方面从文化、文学、学术、社会、政治、法律、教育、制度、地域等多个角度,对《诗经》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先驱者有郭沫若、闻一多,后出现了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王巍的《诗经民俗文化阐释》。相对于大陆研究的多元化,港、台学者的研究更趋传统,法国、日本学者则使用了宗教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亦有创建。

《诗经》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其中的“国风”为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域民歌,在相对闭塞的先秦时代,国风承载了丰富的地域文化思想,地域性特征是其根本的特性。《诗经》国风虽经统一修改编纂,仍保留了较多的地域文化特征,是研究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史料。《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产生于不同的地域,“二南”之中正平和,“邶、鄘、卫风”之忧思伤怀,“郑风”之自由轻快,“王风”之悯周忧思,“齐风”之舒缓阔达,“魏风”之悲苦忧愁,“秦风”之悲慨豪迈,“陈风”之巫风弥漫等。

通过探讨《诗经》十五国风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特点,可以梳

理《诗经》中体现出的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特征，深入研究地域文化对《诗经》产生的影响，考查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总结提炼不同地域诗歌的思想品格和精神特质，在此基础上，考察地域文化的发展演变轨迹，揭示、诠释周代华夏“雅”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探讨中华文化形成早期的历史传播体系。

二、地域文化与地域人格及中华文化发展

从人与文化的角度看，人的性格是其所处文化情境的映射，如果我们对人的性格特征从文化的地域空间分布的角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生活在不同文化地域中的人，在性格特征上总是存在差异的，这就是地域文化性格的现象。《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载：“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从中可以看出，地域历史地理的不同，造就了不同地域的人文风俗，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地域人格。

地域文化性格是当我们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人类的“群体性格特征”在地域分布上的状况进行观察时所感知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的性格除了受先天遗传影响所形成的某些特征外，还深受他们生存的特定文化环境的后天的影响，由此便引出了对性格形成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化性格，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是“文化和人格”学派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文化与人格”研究又常被称为“心理人类学”“心理文化分析”等，这一研究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大于生物因素对人格的影响。由于文化环境的运行所形成的性格特征称之为文化性格。

地域文化性格，就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地域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带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地域文化性格是世代生活在特定文化地域中的人们，在地域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普遍性的稳定的心理趋势和价值取向，同风俗、习惯、道德、信仰、思想、观念相比较，地域文化性格是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淀。这种地域文化的性格构成该群体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群体的鲜明特征。

和个人性格相比，地域文化性格首先是一个集合型概念，它所指的不是文化区中个别成员的性格。地域文化性格是个人性格的轴心，虽然每个文化地域中都会有特别成员的性格偏离这个轴心，但就绝大多数成员来说，个人性格都是围绕这个轴心的。其次，地域文化性格具有延续和传递的力量，个人性格是随着个体生命的结束而终止的，而地域文化性格则伴随着地域文化观念积淀下来，并借助传统的力量传递下去。地域文化性格对个人性格具有一种社会约束力和同化力。

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地域文化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我国文化在新的整合基础上实现文化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地域文化丰富多样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个体都是该文化的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命存在的要求而积淀下来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智慧。正是这些多样的生存智慧，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能够相互启迪，取长补短，使得中华文化呈现持续发展的活力。失去文化的独立性，就意味着失去社会发展的独立性。关注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就在于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特性，防止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对外来文化的依赖。

第三节 地域文化的形成

地域文化形成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中国早期地域文化可以理解为“风俗同，语言通”，它的格局形成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首先，商周时期的民族宗法制度崩溃后，地域原本的地理、民族、习俗等差异开始显现出来。其次，诸侯国割据，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上的差异。再次，哲学思想家“百家争鸣”，从思想、世界观、价值观等哲学层面使得差异进一步加大。综合上述三方面原因，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区域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等。后随历史推进，又形成了岭南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客家文化、关中文化等。这种文化的地域性形成的过程是从小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地域文化的最小单位就是文化丛，它往往是一个产生于一定时间和空间的“文化内核”，内核不断凝聚相似文化从而形成文化圈。就像宇宙中恒星的形成过程一样，不断吸收周边文化圈，最终形成文化区域，也就是地域文化。如新疆的绿洲文化，从一个个绿洲到整个新疆地区。

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一、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自然环境是地域文化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以及自然资源。比如以太行山为界，山的東西两面气候、环境的不同，就孕育出了山西和山东文化。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多元，如，南北差异，这和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内蒙古一带的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以及沿海的海洋文化，这都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